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序 言

来新夏

宗一和我结识近半个世纪，是一位易于相处的朋友。过去大家都各自忙于工作，又在那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所以来往较疏。近年来，由于彼此住处较近，又有一种宽松闲散的氛围，所以常常交换一些读书所得，或商榷文字。过从既多，对他的了解也渐深。他能笑看人生而自有主见，不随波逐流而我行我素。宗一可以说是一位性情中人，也是一位可以放心交往的朋友。他籍隶满洲，而负笈津门，从师于华粹深、许政扬诸名家之门，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特别是小说戏曲方面的功底。几十年来，他在澹泊而不宁静的生活中，写下了若干著述和论文，成为这方面的知名学者。可惜我抱残守缺于自己那狭小的专业范围内而未能认真地读他的著述，给我的知识库留下一块空白。1994年，他送我一厚册自选集，我粗粗地翻读了一遍，深感他确是无愧于师教，在古典小说与戏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前年，我应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之约，编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时，为了慎重，特请宗一为我通看一下。没有想到，他非常认真，和他新婚不久的年轻妻子一起，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逐篇阅读了我的文稿，并提出了分类、编次、调整 and 修订的意见，消除了不少失误，我对宗一伉俪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也感到欠了他们一笔人情债。

去年，山西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当代学者文史丛谈》，我和宗一都在应邀之列。宗一很认真地搜检他的历年积存，选编成集，题名《走进困惑》，并送来我看。有债必还是为人的规矩，便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不意宗一还要我付“利钱”，为他的随笔集写一篇序。可能他知道我写序必看全书的习惯，便以此来督促我通读他的全稿。我虽没有他们夫妇那样仔细，但却是认真读了全书。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早应该走出困惑，但还是以《走进困惑》名其书，表示他对已有成就的不满足。这种学然后知不足的学者风度意味着他没有丝毫“歇窝”之念，而仍在精进不已。

宗一这本随笔集是从他的大量成稿中筛选出来的，共得七十余篇，大体分为七类：有追怀师友之作，情真意切；有论学谈道之篇，胸臆独抒。足证其有宗师而无门户的坦白襟怀。他怀念李何林、华粹深、许政扬诸先生的文章，决非一般例行的悼念文字，而是真正的心灵冲刷。这三位先生都是我的旧识：李、华二先生是我的前辈，政扬则是同辈人。宗一悼念何林先生不是只推崇老师的学术成就而是在灵前真诚地做自我忏悔。他的坦诚自责，不只是求谅于亡师，更值得动情的是他吐露了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困窘心态。他写了长长一篇纪念华粹深先生的文字，从学术到生活，细致入微，句句发自肺腑。他难忘华先生谆谆教诲他要以“场上之曲来分析作品”的薪传。时至今日，宗一犹能随时照顾华粹深先生的未亡人黄湘琬女士，当此世风浇薄之际，宗一所为不啻空谷足音。政扬是一进南开大学就以其学术造诣受到注重，乃同辈中之佼佼者。可惜英年早逝，空留屈子之恨。宗一以极深沉的感情，饮泣悲歌，蘸墨和泪，成文两篇，凡身经其时其事者，得不怆然而同哀。政扬有知，固不虚此人间一行。

文学史和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是宗一的专攻。他写过大量的论文和随札，特别是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各篇更是集中了他在这些方面的见解，而且有不少能引发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他赞同重写文学史，并提出了更深层

的如何重写的问题。他认为文学史是心灵的历史，而重写则“应当站在当代的文化立场上，提供一个重新认识文学历史现象的新范式”。这个标尺对其不同领域中史的研究和重写都有参考价值。他在有关文化的论述上，如梦文化、鬼文化以及青楼文学等等，没有停留在仅仅论辩问题本身。他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立论，主张研究和写作不只是用笔墨，而应是持一种“心史”的态度，以“杜鹃啼血”的精神去研究和写作。这无异是用双手齐按在琴键上所迸发出来的最强音。

《金瓶梅》是一部被淫秽眼光看作淫秽之作而遭到圈禁的古典小说名著。我看过足本《金瓶梅》，也读过不少研究性的论述，才对这部古典小说名著有了一些自认为比较准确的认识。但视点较低，仅囿于作者问题、兰陵笑笑生的籍贯、《金瓶梅》与《水浒》、《金瓶梅》人物以及《金瓶梅》与明代社会等等，而宗一则把《金瓶梅》置于“旷世奇书”的地位上来研究，从该书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和说部地位等方面来审视这部被蒙上灰垢的古典小说名著，认为这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书，是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它的不可救药的谴责小说。如果把《金瓶梅》归类于谴责小说，那比清末的谴责小说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位年轻学者说：“不合理的禁锢以及病态的张扬，均是扭曲。”宗一的研究正是针对这种扭曲，要揭去《金瓶梅》“无可奈何地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面纱”，而恢复其“固有的性格”。其有关各篇多为条畅易读之作，如《我读〈金瓶梅〉》一文就是我接受了他的看法后，约他为我主编的一份季刊写一篇如何读《金瓶梅》的指导性文章，但他不好为人师地改用了现名。

近年来，宗一似乎对武侠小说的研究情有独钟，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后，也纠正了过去视武侠小说为支流别脉的偏见。其实，儒侠共生，源于周秦，司马迁以侠者入史，不愧为史圣之卓识，而《水浒》横空出世，使武侠小说覆盖愈广。宗一曾界定武侠小说是“它以虚构的梦幻形式，揭示历史、人生及人性的现实”，并称武侠小说为七彩瑰丽的艺术世界。他更亲自品味精品，推荐杰作。这些无疑为武侠小说读者开拓了视野。

宗一于戏剧涉及面甚广，京、昆、评剧都有所论及，对戏剧理论、编剧技巧更持有一说。我疏于此道，颇难置喙。唯读其论书会才人睢景臣及其《高祖还乡》之作，则深庆政扬之学复得宗一为之延续发扬。至于书中多篇阅世之作，则斯人也而有斯言也。读其文者，当知其人。

宗一文稿既定，俾我先读，并命序其书，遂逐篇阅读，多有所得，信笔札录成文，虽意犹未尽而序忌累牍，乃戛然止笔。设宗一能略缩长篇为短什，题文再加简练，则不仅利读者有随读随停之便，更能体现随笔的内涵立意。不知宗一以为然否？谨叙缘由，是为之序！

1997年元月15日写于遂谷

## 卷首絮语

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回首历代硕学大家，文章巨公，莫不淹贯文史，通才博学。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学文，人为割裂，鲜能造就通才，甚而文不通顺，史误百出。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曰《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综观金性尧、黄裳等老先生，均为国内文学历史界卓有建树而兼通文史者，为关心文史者所熟知。此次慨允我社之邀，精心选撰其文史随笔，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源流，广征博引，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谈古论今，烛幽洞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宁宗一先生是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治学专于宋元以来小说戏曲，一部《说不尽的<金瓶梅>》，颇邀盛誉。近年，又沉浸于武侠小说，多所创建。本集名为《走进困惑》，寓意深沉。内述“书生悲剧”、人生坎坷，亦可当史读。宁先生诚然名家，注意史实考据，长于思辨但更关注人生，笔触所到，真情率然，这是本集的特别之处。



## 走进困惑

## 灵前的忏悔

灵堂，恩师安详地睡在松柏花丛之中。

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凝视着我永难忘怀的面孔。沉痛的人流不允许我再停留片刻，然而就在那极短暂的一瞬，我真想匍匐在他的躯体前，向我的恩师作最后一次的忏悔。

我像很多南开人一样，承受过李师的恩泽，或者在一些人眼中我还曾是他众多的宠儿之一。可是再没有比我自己更清楚，我恰恰是先生的不肖弟子，也再没有此时此刻我感受着的那种撕心的愧疚和负罪感。

往事如烟。但是刻在心灵上的往事却永不会淡忘。

1954年我刚刚毕业留系工作，就碰上了全国性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当时系里教师还不多，开会总是把各组合在一起。李先生的习惯是既主持会议又总是第一个重点发言者。那天的会是第一次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先生开宗明义地说：胡适有功也有过，今天主要是批判他的过，但也不能就说他在“五四”时期什么贡献也没有，比如他提倡白话文，比如他承认文学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当时，凭着我四年大学政治运动中培养的嗅觉，我立即觉察出先生的发言“不对味”，觉得必须反驳。我抓住李师肯定胡适“文学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一句话，大作文章。我凭着自己那点可怜而又浅薄的文学理论知识唱起了“反映论”的高调，论证起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用以批驳文学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错误”说法。一场争论就由我挑起了。先生凭着他的认真、执著的态度，我则依靠着少年气盛，争得两个人都面红耳赤，而且各不相让，弄得在座的教师都很紧张，几乎没有一位老师发言。整整一个下午的会就被我这个混小子冲散了。事有凑巧，当晚我因急性扁桃体发炎而发起了高烧，第二天的会我没有参加。黄昏时过，何林师推门而入，从兜中掏出一支体温计而且摸了摸我的头，给我试起了体温，嘱咐我好好休息两天。他走后不久，二先生（我们都亲切地称李先生的胞弟为二先生）提着饭盒给我送来了热乎乎的白米稀饭和小菜（当时我们住的集体宿舍离李先生家约有四五十米），并说李先生的意思是这两天先不要到职工食堂吃饭，每天会给我送稀饭来的。听到这话，看到那盛得满满的白米稀饭，我的眼睛湿润了。由衷的悔愧使我在二先生刚刚走后就爬起来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检讨了自己不应自以为是，在会上大吵大闹，惹先生生气，并表示愿意在一定场合向先生公开道歉。第二天清晨二先生来送早点，我把信恭恭敬敬交给二先生，求他转呈李师。刚到中午，二先生又来送饭并带着先生的一纸手书。信上说：他根本没有为会上的争论而生气，争论是正常的事，无须向他道歉。信的最后有一句最使我震惊的话：“我从你身上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先生的博大磊落的胸怀，他的心真如大海！他并不以我在众多教师面前给他难堪而介意，而且以理解年轻人的态度看待我的缺点。他的温和的批评又带着某种自谦，他没有以一系之长的姿态来压制我那幼稚的积极性，他是用真正平等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而且是那么亲切。我油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就是我寻找的父亲般的导师！1983年鲁迅博物馆为先生八十大寿举行庆祝会时，我代表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在会上作了发言。我脸朝先生，重提此事，先生面带笑容，点了点头，似还记得这件在他看来只是有趣的小事，然而对于我，这却是一件大事。从这件事开始我才逐渐学会怎样对待我的学生：要有一颗爱心。

刚批完胡适，就“因势利导”批起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次文科几个系在图书馆开批判会，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第一个发言的是郑天挺先生，他拿着卡片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性发言。紧接着，我不知道自己是出于历史使命感还是想出出风头，竟然面对一百多位文科教师，作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大“文章”。开始自我感觉颇好，但很快发现与会者似乎都已陷入茫然的境地。发言结束，我确实有点尴尬。在场的李先生好像发现了什么，在我刚发完言，就说：“刚才小宁的发言的中心意思就是《红楼梦》的作者的世界观是矛盾的，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也是矛盾的。”不仅几句话就把我要说的意思交代清楚了，而且给了我一个台阶，没让我在大批教师面前过分出丑。当时我就感到了这是老师对自己的学生的另一种爱。

后来市里准备召开一次批俞大会，点名让俞先生的得意弟子华粹深先生参加。华先生显得有些紧张，先是找我谈，问怎么“批”法。我当时顺口说了一句：让您参加市里的这个会，就是让您和俞先生划清界限。言下之意是希望华师顺应一下“潮流”。华先生当时面有难色。我出主意说，到李先生家问问。当华先生请李先生“定调”时，李先生头一扬，不加犹豫地说了几句：“批俞先生是批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又不是让你交代和俞平伯的师生关系。”第二天我同华师到市里开会，华师果然是按李先生的意思发了言。一位市领导在总结时不指名地批评了华先生，意思是华师没能从思想感情上和俞先生划清界限。然而事实证明，当时我以我所领会的领导精神，给华师出的是个馊主意，而李先生却出于中正，保护了华先生的一颗忠诚的心和高贵的学术品格。

过分的认真，在先生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中正、磊落，而因此带来的缺点则是执拗。在为鲁迅小说《药》的结尾的寓意的争论上和众多学术问题上，多少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然而学术可以如此，政治却是无情的。你要公正吗？那你迟早就要受到惩罚。反胡风开始时，我们几个小青年觉得大有用武之地了，写批判文章，作巡回辅导，还有各种大会的发言，当时风头出尽，颇为得意了一番。一天中文系散会后，有先生、有华师和许政扬师，我们一路往家走。先生突然带点激动的口气说：胡风和周扬积怨太深，周扬的宗派情绪一直很强，鲁迅如在世，日子怕也不好过。我听了真是陡然一惊，先生，这不是您在《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中阐发的观点吗？可是今天的气候，您怎么也给抖了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们几个人的态度只是沉默，谁也没说什么。然而我私心却隐隐感到李师的这些话是不是在有意提醒我一些什么？

此后 1957 年“反右”，李先生公开称所谓的“右派”先生是同志，1958 年“拔白旗”运动，他又公开称两面“白旗”的政扬先生和汉麟先生为“两匹好马”，这一切都构成了李师的罪状，终于在“文革”浩劫时得到了一次总清算。然而历史却又又一次证明先生是绝对正确的。

1959 年反右倾运动开始，我因为带头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后来又因告密者揭发我的一些私下言论，教师团支部整整批了我半年。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恋爱观一大串问题，再加上反“三面红旗”，我被贬黜了：撤掉团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秘书职务，1960 年不予晋升讲师等等。似乎一夜之间我从党的助手、积极分子、左派，一变而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当时动辄得咎，大批朋友开始疏远我。当时我



痛苦到了极点，什么都想过。就在这时，华先生捎来了李先生的口信：告诉小宁，碰点钉子不是坏事。正处于拂逆困境的我，这话确实使我悟到了点什么。

然而历史总是捉弄人，甚至叫你哭笑不得。李先生为了“一个小问题”招来了大麻烦，全国展开了批李运动，中文系首当其冲。真不知当时系里的某些领导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找我谈话，命我执笔写批判李先生“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我“受宠若惊”，“废寝忘食”，整整干了两天两夜，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炮制出来了——《批判李何林同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章写就，我却有点良心发现，我自问：我是在干什么啊！我现在要点名批自己的老师？一点点可怜的良知驱使我在晚上带着文稿悄悄地到李师家，我请他过目这篇“奇文”。有趣的是，先生仍像修改自己学生的作业那样严肃认真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沉思半晌才对我说：“文章写得太长，句子仍然是那么欧化，有的地方批我批的不是地方，有些地方你根本没理解我的意思。”这真是一出含泪的闹剧。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要找我“批判”的对象去看批他的稿子，我更不理解李师又为什么能用他那凝重、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看他的一个“背叛者”写的稿子。后来批判文章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署名在《河北日报》上用两天两版的篇幅发表了，而且《文艺哨兵》杂志当期加以全文转载。我记不起我当时是什么滋味，我只知道，未动笔而署名者觉得算是认真地参加了这场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纯洁性的斗争。事情过后我曾暗自高兴，当时幸亏没署执笔者的名字，不然我将无地自容。然而历史的反思就是如此残酷：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这篇混帐文章毕竟是出于我之手啊！这良心的谴责，这沉重的包袱，这欠下的债，何时才能从我的心灵上抹掉呵！我负恩师！

对我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 1963 年又搞了一次晋升。当时的系领导并未因我写过“批修”的文章而否定我是“小修”，问题既然如此多，当然不予考虑晋升讲师。事后我听知情者说，在校务委员会上（当时晋升讲师也是要经过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李先生拍案而起，明确地说：“只讲过两节课的人都升讲师了，宁宗一讲了整整九年的课，学生都一大帮了，还不是讲师，说得过去吗？”由于李先生的力争，由于李霁野先生和许多爱护青年人的师长的支持，我才结束了九年的助教生涯。不过后来总支一位副书记通知我：“你这次只升官不加钱。”我知道他在利用他的权力捣鬼，而我对先生的知遇之恩却倍加强烈感愧了。

1985 年 3 月，完全出于性格的原因，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我作了一件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后，听我的一位朋友说，先生在听到我的这件事时只是沉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从不提起我，即使在我卧床养病时期的 1985 年和 1986 年，他几次来南开开会讲学，我则因无脸见他，他也从来没看过我一眼。我知道，我在他老人家的记忆中已经消失。我算是伤透了他的心。

1987 年李师卧病在 301 医院治疗。第一次是黄克同志陪我去看他老人家的。我因心情沉重，再加上那抹不掉的羞耻之心，所以表情尴尬。而先生当时精神尚好，对我似不生任何芥蒂，问了我很多事。我告诉他，我已经调离中文系到东方艺术系工作了。临别时我握住先生的手，他也用力地握了我的手。我觉得先生的宽容，又使我回到了他的身边。但是还不到两个月，我突然收到黄克和本相捎来的信，他们告知我：他们在看望先生时，提到了“宁

宗一还要来看您”，先生听后感情激动，全身颤抖，似有许多话要说！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约上我同班挚友潘克明一道到北京看望先生。当时胡昭衡同志在场，他走后，我们围坐在先生的身边，先生不停地流泪，我们却无言劝慰，只能用眼泪来诉说心中的悲痛。第三次探望先生时，先生两眼只能呆呆地望着我了。我朦胧地感到先生的时日不多了，我忍不住地脱口而出：“李先生我真对不住您，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我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伏在先生瘦弱的身上大哭了。再也没有这个时候我更感到悔愧的滋味是多么让人难以承受。第四次看望先生时，我和家鸣同志都觉得和先生失去了感情交流的渠道了，他身体侧卧，双眼紧闭，只是透过那微弱的呼吸声，我们才感觉到他似乎知道我们又去看望他老人家了。而对于我来说，我充分觉察到我再不可能让他亲耳听到我要向他忏悔的一切。

李先生给予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以致于一种奇异的现象摆在我的面前：你和他相处的时间越长，你就会觉得有愧于他的东西越多；你和他打交道的事情越多，你就会觉得欠他的账越多。而正是这一点，我总觉得有负于先生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

先生自解放后就与南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离开了他执教三十多年的南开中文系，而我也在这时调离中文系到东方艺术系工作了。李先生以八十五岁的高龄离开了这喧嚣的尘世，而我却碌碌无为走过了五十八个年头的开始进入老年的行列。然而时至今日，在我眼前不时地出现先生坚强的项背，他仿佛始终在我前面走着、引领着。而他留给我的我所永远珍惜的记忆，我已经意识到，它对我是一副沉重的包袱，以致时时感到不安。但我却实心实意愿意永远背着它，让我在今后人生的艰阻的道路上时刻不忘记所应吸取的一切教训。

先生，在您灵前的真诚忏悔，是我在梦醒后对道路的寻找，是您最终让我认识到对自我人格的确定是我们知识分子也是我个人自省自醒的表现过程和奔赴的目标。您的人格和文格表现了一个大写的人的良心和良知。在您的灵魂的光照下，但愿我们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像您那样活得无亏于心，也无愧于人。

何林师不朽！

1989年3月26日谨蘸泪成文，  
以献于何林师在天之灵

## 华粹深先生的“戏曲情结”

经过整整十个月的搜集和整理，华粹深老师创作、整理、改编的剧本和戏曲评论的复写稿，已经是厚厚的一摞。现在轮到我要向敬爱的读者交待这部集子的缘起了。可是，已经是好多天，在我面前铺着的依然是一张白纸。不知为什么，面对着华师那心血的结晶，我总是难于命笔，而又总是陷入沉思：华师那副和善、慈祥的音容笑貌，宛然在前；他那吐哺握发的诲人不倦的精神，总是萦绕心际，而随着时日的推移，翻滚起的却又是一幕一幕的绵长回忆。

### 一

我是从华师的几十年的生活和多次对我的谈话中，了解到老师是怎样同我们民族的戏曲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华师出身并非梨园世家，而是一个没落了的满清贵族家庭。他从小酷爱京剧、昆曲、梆子等剧种，民族戏曲艺术之美老早就在他幼小的心田中播下了种子。他经常风趣而又有些神往地谈起：“我小时，大人给的零花钱，全部送给戏园子了。后来上了中学，为了看戏，宁肯去啃窝窝头。”

得天独厚的是华师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是朱自清、俞平伯二先生的得意弟子。在名师的教诲和指点下，他早就有了坚实渊博的文史知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为他后来从事戏曲编剧和评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5年毕业以后，就应聘到程砚秋、焦菊隐、金仲苏、李伯言主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担任文化教员。戏曲学校的环境对他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教学之余，除了看孩子们的练功和排戏以外，就是带着小学员去观摩当时名角的演出。听千曲而晓声，观万剑而识器。四十年代，华师的处女作《哀江南》一剧在《新民报》上连载一个月。与此同时，《新民报》及其他报刊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他的《听歌人语》等戏曲短札的发表，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和研究的生涯。然而，应该说，华师的戏曲艺术才华真正得到重视和施展，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温暖的春风驱走了严冬的酷寒，把欢乐、幸福与希望带给了人间。华师在南开大学执教期间，除担任明清文学史和民间文学的繁重教学工作以外，还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天津市的戏曲改革工作，先后任天津剧艺协会副主席、戏曲编委会副主席、天津戏改会主任委员、天津戏剧编导委员会委员、天津文化局创作室副主任、天津戏校副校长等职务，并在1952年作为天津戏曲代表团团长率队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从此他以更加辛勤的劳动，在戏曲这座百花园中呕心沥血，播种耕耘。他以饱满的热情，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编改了好几个剧本。其中获得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剧本一等奖的河北梆子《秦香莲》和天津市剧本一等奖的河北梆子《打金枝》等作品，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为了切实推进天津市京剧、梆子、评剧的推陈出新工作，华师认真地考察了我国浩如烟海的各种戏曲源流，不论新老剧种、大小剧团，他都不放过观摩学习的机会，并与很多地方剧种的编剧家和艺人结为挚友。由于长期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加之华师文思敏捷、想象丰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十年左右时间，共改编、整理了近三十个剧本，其中一部分还是新剧作。

与此同时，他非常注重研究戏曲艺术规律，普及戏曲常识，写出了大量戏曲方面的论文，应当说，这是他的艺术生产的丰收期。

在长期从事戏曲改革的工作中，华师越来越感到戏曲教育工作的落后、戏曲理论批评队伍的薄弱，而演员队伍也有后继乏人的征兆。为此，他在天津狠抓了戏曲教育工作。他在担任天津戏校副校长期间，四处奔波，为戏校访求名师，他自己也不憚辛劳地忠实于“传道”职责，坚守在戏曲教育的岗位上。他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民族戏曲艺术的兴趣。他在课堂上，多次介绍我国丰富的戏曲遗产，阐发他的戏剧艺术观。他认为：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它把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文学、音乐、绘画、雕塑、杂技、说唱艺术等熔于一炉，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卓越的表演艺术。因此，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戏曲艺术是最充分、最集中地体现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华师的一些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谆谆教诲、引导下，逐渐地步入了戏曲艺术的殿堂。

写到这里，我又回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和华师之间的一段小插曲：我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第一个留在他身边工作的助教。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对我关怀和培养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是他手把手把我送上了讲台。可是有一次我竟然把这位好脾气的老师惹得发了火。那是因为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京剧《玉堂春》，我竟然在座椅上昏昏入睡了。戏散后，一路上他“训”了我一顿，并且提醒我说：“你现在正教元曲，怎么能不看戏呢？不看戏，就很难讲好戏。”也许他觉得自己过分严厉了，所以又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剧本只是半成品。要理解一部剧作的全部构思，是很难离开舞台艺术形象的创造的。今后要多从‘场上之曲’来分析作品。”今天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有如坐春风、亲聆教诲之感。

华师特别善于用“潜移默化”的方法诱导学生去接近戏曲，领悟其妙谛。有时他讲完课以后就说：“谁有兴趣，可以到我家听听唱片，可能会加深你们对我所讲的问题的理解。”而在听完戏曲唱片以后，他总是很仔细地分析演员的风格流派和师承关系。有时他又用“聊戏”的方法提高我们的鉴赏力。比如看完一出好戏，他就要拉我到我的另一位导师许政扬先生家里。开始时，我总是静静地听着他们放情的谈论，品味着他们关于某部剧作、某个演员表演的耐人寻味的意见，继而就把我也吸引了进去，三个年龄悬殊、学术和鉴赏水平又有很大差异的人中间，却总是在最后涌起会心的笑浪。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初夏，阴云密布，浊浪陡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文化的动乱揭幕了。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华师平白无故地遭到了迫害。肉体上的摧残，也还能够忍受，而在精神上的折磨，则使他难以支持。就是在这个“扫荡”一切的日子里，他的手稿，他珍藏的图书资料，荡然无存。特别是他用几十年心血搜集、保存的几百张极其珍贵的戏曲唱片，竟然当着他的面被付之一炬！事后华师惨然地对我说：“我这一生，可能这是最动我心的事了。”是啊！尽管华师几经战乱兵燹，好像都不似此次这般领略“彻底砸烂”的滋味。这位一生清白、正直、善良，潜心致力于教学传道的老戏曲教育家，面对这些，又怎能找出顺乎情理的答案呢？

1976年10月以后，华师虽然感受到春风的暖慰，但十年的腥风血雨，他已明显地衰老了，而且重病缠身，在一次大手术后，我们敬爱的华师，竟从此卧床不起。

手术后到华师辞世，这是痛苦的三年。对于华师是痛苦的，对于我们这

一群由华师亲手扶掖起来的学生们也是痛苦的。但是，正是这三年，我觉得我们和华师的心贴得更近、更紧了。记得有几个晚上，我在医院陪护他时，他曾悄声对我念叨着：“如果天假我以时日，我还要改编和创作一些剧本。”在我向他介绍当时戏剧界正在讨论戏曲的所谓“危机”时，他又深沉地说：“我真希望再到剧场坐一坐，看看现在京剧发展得怎么样了。京剧就是缺好本子啊！”听了这感人肺腑的话，我理解到，即使病魔缠身，他仍遨游于创作的境界中。

197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华师被推选为主任。他在病床上仍然十分惦念研究室的工作。每当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总叮嘱我：研究室初建，要有个计划，有个方向，注意后备力量的培养。他甚至想着研究室珍藏的那一批戏曲唱片，让我们注意，别使它们受潮，该转录到录音带上的要立即着手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却又发现他显得烦躁不安。初时，我以为是病痛折磨所致，但一经询问，他就痛楚地对我们说：“我这个研究室主任完全是挂个名，做不得实际工作，我心里总是不安。”他说得真实极了，诚恳极了，没有一点点矫饰，我简直看到了他那认真的谦虚的仁厚的而又是透明如水晶的心。

在他病情稍许好一些时，总是催我通知他的几位研究生到医院去上课。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然而又是那样庄重地坐在轮椅上为研究生讲戏曲掌故、京剧源流和风格流派。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他是躺在床上讲课，尽管那时他的语言已经不很清晰了。这位杰出的戏曲教育家、剧作家，在随时可能告别人间时，并不吝惜自己最后仅有的这点生命之火。今天，我是噙着热泪，记下这“生命之歌”的最后乐章的。

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称颂我们的老师在戏曲教育和戏曲创作上的煌煌业绩。记得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在他的自传中说：“没有梅耶荷德就没有我。”我们当然不能作此不伦的比拟，但是不妨借用这句话的语意，那就是没有华师也没有我们。华师桃李满天下。我们之所以走上戏曲教学的岗位，从事戏曲编辑工作，或是搞起了戏曲研究和剧本创作，都是和华师的引导与教诲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华师影响了他曾教育过的我们这一代人。

是的，在华师的生活日历上，尽管也有伤心的日子，也有苦闷的春秋，可是他艺术的心是年轻的，是经霜不凋的。我们祖国悠久的光辉的民族戏曲艺术，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他对戏曲艺术的一腔共患难、同生死的感情，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 二

华师对于戏曲艺术事业的坚贞不渝，不仅表现在他在戏曲教育岗位上不憚辛劳地忠实于“传道”的职责，也表现在他继承了前人的艺术精萃，勇于革新创造，为民族戏曲艺术的宝库增添异彩。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几个剧本，就充分说明华师的多才多艺。他的剧本取材广泛，样式多彩，这里不仅有改编和整理的作品，还有个人的创作；而涉及的剧种既有京剧又有昆曲和河北梆子。在几个大剧种上，他似乎都是行家里手。他所塑造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有起义英雄和市井细民，展现出的是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风俗画。

对于华师剧作的长短得失，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不敢妄评，这需要由舞台实践来检验，也要由专家学者去评价，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们的想法。

首先，戏曲编剧不易当。原因是：作为一个戏曲编剧，既要有创作人员的基本素养，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又要熟悉戏曲艺术的规律和剧种的特点，更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那个剧种。所以，历来戏曲编剧人才，最为难得。然而华师既长于治曲，又精于度曲，而且对于几大剧种的形式、规律了若指掌，运用自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次，写戏需要作者有情。面对着生活，戏剧家若如太上之忘情，则戏可以不做。其实，戏曲和其他文艺形式不同的，只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华师写戏，贵在有情。这和他的戏剧观有密切的关系。一次华师向我谈到古典戏曲美学的特点，他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汤显祖评点的《董西厢》，朗诵了汤氏的题辞：“嗟乎！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张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间，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于笔墨烟波之际。……”紧跟着又引用了李渔在《香草亭传奇》序中的一句话，他说：李渔主张一部传奇是否能流传有三个条件：“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华师认为我国古代戏曲家已经发现和总结了写戏的“秘诀”，很值得重视。

事实上华师正是实践了这些艺术理论和经验。综观华师的剧本，不论何种题材，不论写何色人等，在其整体形象世界背后，都蕴藏着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激情和鲜明的审美倾向。他的代表作河北梆子《秦香莲》（整理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在传本的基础上升华了人民的爱憎感情和是非观念。

情，各个人自然是不同的，情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因此，只要你稍一浏览华师的剧作，就不能不被他那爱国主义激情所牵引。但是华师绝非凭一时的政治热情，率尔操觚。华师对祖国深挚的爱和那跳荡的政治热情，对于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可宝贵的。更何况华师的爱国主义精神亦非无源之水。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师的祖父在伪满当上了大官，曾来信招华师去东北，可是华师却严辞拒绝。他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宁肯过极为清贫的教书生活，也决不肯为享受而背弃祖国。他的这种民族气节，他对祖国的这颗赤子之心，是他在教育和戏剧园地辛勤耕耘的精神源泉。

说到赤子之心，我们不能不提到华师的很多挚友对他的称誉——他有一颗“童心”。是的，我觉得这是一把开启华师心灵和作品的钥匙。他的性格特点是单纯、胸无城府，直到他年已古稀，还给我们一个“老小孩”的感觉。他是那样温和、慈祥，但又不时流露出那么一点点孩子式的执著和认真。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宝贵品质，自然也会关系到艺术作品的生命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一颗心，才会对真善美、假丑恶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遭到那么多生活折磨和倾注了整个身心于艺术的人，可能已经过早地衰老了吧！其实并不！重要的是一颗为人民、为艺术的心。我常想，华师生前在他回顾自己漫长的生活与艺术的道路时，所想到的将是什么？历史作了回答：纸墨寿于金石。在1981年第11期《人民戏剧》上，陈朗先生写了一篇谈到北方昆曲剧院新排《牡丹亭》的文章，其中就公正的提到了这样的事实：

把《牡丹亭》压缩成为一个晚会演出，解放以后并不始于今天的北昆剧院。1957年北京昆曲研习社就曾排演过，本子是经华粹深先生整理和该社社长俞平伯先生校订的。当

时还特地从上海请来了朱传茗、张传芳、沈传芷、华传浩四位老师，来为社友们排戏。参加演出的有袁敏宣、周铨厂（庵）、张允和、范崇实等。那次是为了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四十周年而演出，也可以说是一次盛举。当时只作为内部观摩，曾在文联礼堂等处所先后演出过好几场。1959 年为建国十周年献礼时，又在长安戏院公演过两场。接着，上海戏校由俞振飞、言慧珠两位校长率领师生们到北京也演出过，所演的即是部分参考了华、俞整订本。

同《牡丹亭》改编本一样，现在舞台上仍然搬演着华师整理、改编过的《秦香莲》、《打金枝》、《窦娥冤》等。倘华师地下有知，当亦欣然瞑目矣。

是的，在华师的生命之舟驶向彼岸之前，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戏曲艺术。戏曲已经成了他血肉之躯的一部分，我把这看成是他身上的“戏魂”。今天，他的生命之幕虽然降落，但是显示他新的生命的《华粹深剧作选》之幕，紧接着又揭开了。这部剧作选是华师用一滴滴热汗，一滴滴心血凝聚而成的，也是华师一生宽厚，为事业、为戏曲艺术，度过了七十二个岁月的忠实记录。

## 书生悲剧

### ——哭政扬师

作家常喜欢用诗意的语言说，时间如水。它可以冲淡历史曾经镌刻下的痕迹，哪怕那痕迹曾经是殷红的血迹。有时也爱用富有哲理意味的话说，时间帮助人养成了健忘的毛病，这说出了人生的部分真实。但我的人生经验却是该忘却的早就忘却了，而不该忘却的却永难忘却。三十年来，我正是未曾忘却过我的授业恩师许政扬先生。他是我大半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我早就想提笔写写他了，因为我如果不写他，我就越难释精神重负。也许他在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太重要了，也许他是书生的一面镜子，也许真是那“殷红的血迹”使我不能不照实记述人们知道和不知道的事实。

回忆政扬师要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简称“院系调整”）说起。

1950年我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由西南联大转来的彭仲铎先生，担任古典文学讲授的有华粹深、孟志孙和朱一玄三位先生，语言学 and 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助教只有张怀瑾先生一人。由于很多课程开不出，所以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办法，聘请了阿英、芦甸二位先生讲授文艺学，方纪虽然担任政府部门工作，还是长年给我们讲外国文学，阿垅则开了诗歌讲座课，何迟先生在创作相声改编戏曲之余，应华先生之约给我们讲“人民口头创作”一课，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请了北师大的李何林先生和北大的王瑶先生讲授。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开大学来说不啻为一次“盛大节日”。在我看来，具体到南大中文系，它后来能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中的中文系的前列，是和开国后的这第一次教育改革分不开的。当时我们迎来了希伯莱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家王玉章先生，原南京国学院文研所所长李笠先生，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和陈介白先生，还有文艺理论家顾牧丁先生。教育部为了加强南开中文系的领导力量，特别派了李何林先生担任系主任。与众多著名专家学者一道来的是刚刚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许政扬先生和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安湖先生。不久以后又从北京马列学院调来了古汉语专家马汉麟先生。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师资阵容，各个学科也为之完善，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

我记得分明，院系调整后新学期开学第一次师生大会上，李何林先生自我介绍后，一一介绍了各位新旧中文系教师。而在介绍许师和陈安湖先生时，李师特意点明陈、许两位是清华和燕大的高材生，是作为何林师调入南大的一个条件，特请部里分配给我们的。这颇有文字下加着重点的意味，所以同学们都有很深的印象。如果说到印象，对我个人来说，可能还和二位青年教师的风度有关。他们不仅来自名牌大学，而且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学子的文秀儒雅的风采，所谓文质彬彬也。特别是许师的中式对襟蓝布外罩和中分式背头，瘦弱的外形却蕴含一股灵秀之气，都令我在直觉上感到，这位孙楷第先生亲传弟子，必定是个俊杰之士。实至名归，许师后来逐步显示的学术研究实绩，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第一次直觉的正确。

新学期开始，政扬师到历史系为二年级同学讲一个学年的中国文学通史，要从先秦讲到“五四”前，共一百零八节课。直到1953年第一学期才给我们本科生讲文学史中的元曲部分。他总共讲了二十四节课，四周的课让我



们三、四两个年级的同学充分领略了许师的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这首先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阐释；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如果说这是“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讲授内容更令我们感到深刻和精辟。比如在讲《西厢记》时，首先是顺向考察，这样我们就把握了王剧创造性改编的关键。而在横向比较中，许师从俄译本直接引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我们对《西厢记》爱情和婚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我敢说，在那个时代，我还真没有看到，哪本专著哪篇论文从如此深刻的理论层次上去观照《西厢记》的社会文化蕴含的。

上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的讲课，一律采取“有闻必录”的方式。缺点是不能及时领会，消化课程内容，并在追踪其观点时展开独立思考；但好处是，有了完整的记录可以慢慢消化老师的授课内容。许师的课，最大特色是，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的绝妙的论文。我的办法虽属笨法之一种，但我觉得获益匪浅。四十三个春秋，经过了风风雨雨，许师讲的宋元文学史元曲部分和选修课《元曲》的笔记我至今保存完好。这对我来说都是个奇迹，因为我自己的藏书已更迭多次，讲稿也大多散佚，独独地却保存着许师的讲课笔记，这也算是我对许师的一点真诚的纪念了，如果哪位读者关心我所叙述的这个细节的真实程度，我已准备好了我的这几本笔记备查。

一晃到了1954年6月我毕业了。由于我从性格上考虑，渴望当个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时，却让我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我愣了也傻了，我无法拒绝当教师，但我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我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我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任务。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我谈话，第一条是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条是跟许先生学，一年后担起历史系的文学史教课任务，以便尽快请许师转回本系任教。“跟着许先生学”，这一句话使我安下了心，并于当天下午拜见许师。

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忠诚老实地交底——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本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竟包括大部头的《昭明文选》和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以及仇注杜诗和王注李诗。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做了如下的说明：一、这些书都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看，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包括散佚的书；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记下几条，备用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我就凭着这三十本书为基础，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读，应当说基本上没出现大的纰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